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题解》

王 重 民

唐宋私人藏书目录达到了兴盛和繁荣的时期。这当然是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兴盛与繁荣，一方面反映着官僚地主阶级经济剥削和兼并的愈益残酷。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图书目录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唐代藏书家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的风气比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到了宋代就形成普遍的风气，到了南宋末年竟超过了官修目录。使私人藏书目录在参考使用价值上，有的和官修目录并行，有的在著录分类与考订的方法理论上，提出了新的意见，可以补充或修正官修目录的不足，这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上，起了促进或改革的作用。

宋代私人藏书家编制出了很多的私人藏书目录，（有书名可考的在三十种以上），有的在当时流通很广，后来散亡了；有的一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的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包括赵希弁的《附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和尤袤的《遂初书目》。现存的这四家私人藏书目录中，又以《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题解》最为重要，所以单提出来加以讨论和介绍。

1.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晁氏是北宋时代北方的世族，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住汴京昭德坊）。金氏入侵，晁公武的父亲晁冲之领着全家逃入四川，大概就定居在嘉定。这时候晁公武还在青年，不久中了进士（约在1131—9年间）。大约在1140—7年间，晁公武做了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1148—1170年间，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四川做地方官，1171年方才调回京师，做临安少尹，几个月后，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吏，“累官吏部侍郎”。晚年致仕后，又回嘉定，并且死在嘉定。

北宋时代的私人藏书家多是馆阁中的官僚地主世族，可是到了南宋时代就有些不同了，象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一些蠹民誤國的奸臣要用藏书来装点

門面，而地方上的大吏也多以刻书藏书为“風雅”，很快就成了一时的風气。他們借着“風雅”这个美名来盗用官錢（如朱熹所揭发台州刺史唐仲友的刻书藏案），而被剝削的还是劳动人民。晁公武王处在了这样的变革时期的初期。

井度是南宋初年四川地方上的一位“風雅”大吏。据晁公武說：他“天資好書，常以俸之半傳錄（按“俸之半”是瞎話）。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后已”^①。他还校刻了《眉山七史》^②，編輯出版了三种著作^③，其中《会解楞嚴經》十卷有晁公武的序文。大概井度的写书、編书、刻书都是由他的屬吏晁公武經管的。所以井度罢官以后，把二十年收罗的五十篋书都送了晁公武。

晁公武得到井度的藏书大約在1147年前后。晁公武是热中官場的人，不是什么“清官”，在同一时期內，他自己也必然得到不少的藏书。晁公武又是很博学的人，对于《易》、《书》、《詩》、《春秋》都撰有《詁訓傳》^④，还用国子监刻的《九經》校《蜀石經》，撰成《石經考異》，和他所得的《古文尚書》都附刻在《蜀石經》之后。他自从帮助井度写书、編书、刻书和自己的校书、著书，对于图书有了丰富的經驗，对于古代目录有了深刻的認識，大約在1151年，他的年岁将近五十，學問已經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守荣州的任上，开始了《讀書志》的編纂工作。《讀書

① 晁公武《郡斋讀書志自序》。

② 王先謙校校《郡斋讀書志》卷五《宋书》下。

③ 井度的三种著作均載《郡斋讀書志》內。卷八載井度的《蜀三神祠碑文》五卷，卷十六載井度編的《禪苑珠林》一百卷，《会解楞嚴經》十卷，晁公武在《会解楞嚴經》①下說：“予尝为之序”。

④ 《宋史藝文志》著录晁公武的著作，有《易詁訓傳》十八卷，《尚書詁訓傳》四十六卷，《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

志自序》在目录体系上，或在提要的考訂論辨上，都是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南宋末年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批評他說：“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郡斋讀書志》分为經、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称为“总論”），每类有小序（但小序沒有标明，都編在每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内，这种做法不算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学《崇文总目》的，但偏重在考訂方面，集部別集提要的做法，他自己說是“其人正史自有傳者，止撮論其文学之辞，及略載乡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則杂取他书詳載焉”^⑤。这就是說，他的提要偏重在考訂方面，是企图避开“善恶率不录”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象晁公武这样由世族出身的人，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期，他所热中的是做官，他所亲暱的是井度那样的人，他想保持的是他的家声和剝削特权，这就使他在《讀書志》里，对于封建經典不能不表揚，对于代表門閥世族利益的道学思想不能不称赞，而对于抱有改革思想的进步学派，如王安石的一切著作，不能不竭力反对。总之，晁公武在提要内所反映的阶级性是很鮮明的，他所說的那种客观是不存在的。

《郡斋讀書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約在1157年由杜鵬举校刻的），后来有姚应績重編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无考。約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1249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斋，这就是現在所称的“袁本”。黎安朝命赵希弁校刻，希弁因就他家藏书中为《晁志》所未收的，編为《附志》一卷（实分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这一年，游鈞将姚編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斋，就是現在所称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傳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赵希弁把衢本中較多的435种，8245卷編为《后志》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1884年，王先謙校刻袁本于衢本上，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附赵希弁《附志》于后。現在通用的是王先謙校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編影印的宋袁州刻本。

赵希弁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沒落王孙”。他是江西宜春人，他的父亲在湖南做地方官^⑥。赵希弁本人做过“秘书省校勘书籍”，从他的祖父父亲就都好收藏图书。希弁还撰过《綱目考異》和《通鉴长編补注》等，看来虽說不是很博学，还是嗜书知学的。

但是《附志》的分类很杂乱。他不按《晁氏讀書

志》的类目排列。其中一些新設类目和排列不同的地方，都是赵氏旧目的原本情况。

《附志》共著录了图书486种，多是当时通行的刻本书，正好补充了《晁志》出版以后将近100年中間所出的新书。但由于赵希弁的学識和目录学的訓練都不及晁公武，《附志》的价值是差一些的。

2.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

陈振孙是浙江安吉人。約在淳熙末年（1183—9）降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的“书香人家”。他是永嘉九先生周行已的外孙^⑦，他的父亲也是个讀書人，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做地方官或做中央政府的散官的人家。陈振孙在少壮时期就是过着那种家庭的生活而受过一些图书熏染的。大約在嘉定末年（1217—1224），他已被提升到江西南城的县官，并且已经开始收藏图书^⑧。約在1226—1236年間，他做兴化軍通判（在福建莆田），当时守兴化軍的是楼昉。楼昉是一个很博学的古文大家^⑨，莆田和莆田的附近，又是出版事业很盛，藏书家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这十年內应该是陈振孙收藏图书和对图书目录知識增进很快的时期。之后，又在浙江做了两任地方官，1238年到临安做了国子监的司业。历官某部侍郎、宝章閣待制，1249年致仕。他做司业的时候大約已有五十来岁，致仕的时候大概已有六十多岁，致仕后，还繼續收书，写文章，卒年无考。

⑤ 卷十七《蔡邕集》的提要。《蔡邕集》因是別集第一部，按全书义例，当即別集小序。

⑥ 附志《皇王大紀》的提要論：“紹定戊子希弁生父師回为衡山令”。又程公許坐佑編的提要說：“希弁生父梯倅臺志，先生笔也”。由此知道赵希弁的父亲赵師回做过衡山令和梯州的副职。

⑦ 《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周行已《浮沚先生集》的提要說：“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

⑧ 《直斋书录解題》卷三《九經字樣》的提要說：“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屬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又南城有吳炎者，号晦父，是当时的藏书家，陈振孙宰南城时，从他傳鈔或由他贈送的书不少，均見《直斋书录解題》中。

⑨ 楼昉的《崇古文訣》即刻于守兴化軍的时候。陆心源的《頤宋楼藏书记》卷一百十四所載的宋刻本，有宝庆二年陈振孙所作的序。

陈振孙五十岁以前，在江西、福建、浙江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那些地方，出版事业很发达，藏书家很多，由于他对图书的嗜好，不但购买了很多刻本书，还从藏书家和地方上的文化教育机构传钞了不少的罕传本书籍。当1238年他做国子监司业的时候，他的藏书已经成了家，图书目录的经验和知识也已经很丰富了；他在京师，又看了国子监、秘书省和许多私人的藏书，除了继续丰富他的藏书以外，开始了他的《直斋书录解題》的编写工作。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努力，直到他晚年退休以后，还在家继续补充、修订他的藏书目录。陈振孙的收书时期大约有四十年，编写目录时期也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功夫，真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从事图书目录工作的。

《直斋书录解題》的原本是五十六卷（现行的是《永乐大典輯本》，分为二十二卷），分为经、史、子、集四录（这是书名中书录两字的由来），五十三个类目。他在分类和解題的编写方式和方法上，参考了当时的官修目录和私人藏书目录，并吸取了它们的长处。《直斋书录解題》共著录了图书 51,180 卷，超过了南宋政府的藏书目录（《中兴馆阁书目》共著录图书 44,486 卷，加上續书目 14,943 卷，才仅比直斋多出 8,000 多卷）。在图书的著录和内容的概括上，《直斋书录解題》的参考使用价值也比《中兴馆阁书目》为优，使私人藏书目录在质量两方面都压倒了官修目录。从《中兴馆阁书目》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六百年中间，封建政府都没有编过一部像样的（或者说是正式的）官修目录，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化，而《直斋书录解題》则是这一巨大变化的转折点。

《直斋书录解題》没有总序和大序（也许有一篇叙例一类的序文，后来亡佚了），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有七个类目有小序，可见小序也仅是对于有增创或著录内容有变化的地方才有的。在陈振孙的时代已把《孟子》编入《四书》，又编入《十三经》，而他则把《孟子》与《论语》合为“语孟类”；语孟类是《直斋书录解題》首先创置的，所以要有一篇小序来加以说明。另外的六篇小序，也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才写的。如从子部农家中别出时令书在史录置时令类，从起居注类中别出诏令书在集录中置章奏类；又给经录的小学类和集类的章奏类的范畴作了新的规定，所以在小学、时令、章奏的小序中都作了说明和交代。陈振孙又在子录中恢复了阴阳类，从经

录移来了音乐书，也是同样需要说明的。在音乐类的小序中，陈振孙认为“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陋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是不对的，他“晚得郑子敬氏书目，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所以《直斋书录解題》在杂艺类之前立了音乐类，把乐书看成是杂艺一类的东西，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这在封建社会时期触动一向与礼乐齐观的乐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固然是好的，而陈振孙的思想和观点还是在于维护正统的礼乐。

《直斋书录解題》在著录分类以及编写解題的方式来说，都是有一些新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但谈到解題的内容和思想方面，则完全是站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当然这并不是为奇，也不必苛责或苛求的；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他表现的非常保守，竭力赞扬反动的封建思想，反对进步思想。

陈振孙是永嘉地方的人，又是周行已的外孙。他生在永嘉学派的思想学说发展到了很成熟的时期，对于周行已、陈傅良、叶适的著作不是没有收藏，也不是没有阅读，但在《直斋书录解題》中，他所钦敬表扬的人物和学说，不是周行已，也不是陈傅良和叶适，而是道学家朱熹。他对永嘉学派所讲的经济实用功利主义学说，认为“未得为纯明正大”^⑩。在南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那样尖锐的时期，陈振孙仍然这样的保守，还不肯讲些对于当时有用的经济实用之学，仍然企图用虚伪的道学来欺骗人民，以维护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和所有受王安石思想影响的著作，都一律排斥，比起晁公武甚至是更恶劣一些的。

卢文弨的《书录解題跋》说：陈振孙“持论甚正，如《颜氏家训》以其崇尚释氏之故，不列于儒家。又以前志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等书，皆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为非，当入于子录杂艺之前。又言白玉蟾辈何可使及吾门！其人殆棱棱嶷嶷，识见大有过人者”^⑪。卢文弨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他认为“持论甚正”的地方，也正就是陈振孙保守顽固的地方。

^⑩ 《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习学记言》的提要。

^⑪ 《抱经堂文集》卷九。